

北京诗词学会编
北京市宣武区档案馆

清代宣南诗词选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宣南诗词选/北京诗词学会,北京市宣武区档案馆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ISBN 7 - 200 - 03494 - 0

. 清... . 北... 北... . 诗词—作品集—中国
—清代 . I22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4811 号

清代宣南诗词选

QINGDAI XUANNAN SHICIXUAN

北京诗词学会 编
北京市宣武区档案馆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1230 32开本 20印张 450千字

2005年12月第1版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 - 200 - 03494 - 0 / I · 940

定价:48.00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 - 58572393

《清代宣南诗词选》编辑委员会

主任：段天顺 丁 力

副主任：王 儒

编委：石理俊 柳科正 宇 红 李 敏

李 翔 陈莱芝 周永欣 郭绍英

爱新觉罗·(赵)清甫

主 编：段天顺

副主编：柳科正(常务) 李 敏

序

张文华

《清代宣南诗词选》由北京诗词学会与宣武区档案馆合作编辑。全书选收三百余位曾经在宣南寓居的清代著名学者、诗人、理论家、思想家、宦官的诗、词、曲、竹枝词一千二百余首，内容丰富，生动反映了宣南文化鼎盛时期宣南诗人的情致，描写了宣南的景物和社会生活，是一部宣南士人的史诗，是研究宣南文化以及北京诗史的宝贵资料和文献。这部诗集的问世，使宣南文化从抽象的概念变得更加具体、更加生动，使创新、求实、开放、改革的宣南文化精神表现得更加鲜活、更加真切。她的出版，必将为人们认识清诗、认识宣南文化以及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积极作用。

北京城是历史文化名城，宣南地区是承载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地区之一。尤其在清代，由于全国的文化精英集聚宣南，宣南更成为“人才蔚起、俊采星驰”、“集粹京师文化之精华”的宝地。近年来逐渐被认识的“宣南文化”无疑是宣武区，更是北京市的宝贵文化遗产。在加强北京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宣武区委、区政府开展了对宣南文化的研究，提出了弘扬宣南文化的历史课题，《清代宣南诗词选》正是这个大环境的产物，是我们为弘扬宣南文化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编辑这部书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清代诗人名世者多，传世诗作不胜枚举，既需具代表性，又需优中选优；而非宣南范围不能入选，更使条件设置非常严格。特别是编辑起始阶段正值“非

典”肆虐京城，更为此项工作增加了难度。应该称赞的是，以段天顺会长为首的北京诗词学会的各位专家不怕困难，孜孜以求，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用智慧和心血成就了这部好看、好读、使人感叹、令人心仪的诗集，为人文北京、人文奥运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感谢北京诗词学会各位专家的热心奉献！

酝酿编辑此书时，我在宣武区政府分管文化工作，曾与区档案馆和北京诗词学会多次共同研究此事。应区档案馆之邀，写这些话，以为序，并致祝贺。

2004年12月

清诗漫笔

段天顺

(一)

《清代宣南诗词选》，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并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应该说它是展示和弘扬清代宣南历史文化的一项基础性建设，通过这种展示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宣南文化”在整个北京历史文化领域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清代宣南诗词选》是受北京市宣武区政府的委托，由北京诗词学会和宣武区档案馆合作编辑的。编选工作开始时，首先遇到要编成什么样的选本问题。北京的宣南地区在清代是个很特殊的地区，正如一位学者朋友所说，可能没有一块地方，像宣南地区那样，曾居住过这么多学者、诗人，写过那么多的作品。根据清代北京这一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我们在编辑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地认为：这部诗选不是专门研究清代诗歌流派的选本，也不仅是为现代旅游文化服务的选本；而是从宣南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出发，从它的人文传统、社会风情等综合层面上去进行“挖掘”、“筛选”的诗选。为此，划定出三个编选范围：一是，在宣南地区寓居过的诗人、学者、名士的代表作，名为《清代寓宣南名士诗词选》；二是吟咏宣南地区的名胜文物、园林第墅，以及文人之间修禊结社，雅歌酬唱的诗作，名为《清代咏宣南诗词选》；三是吟咏宣南地区风土人情、社会百业、闾阎民俗的

《清代咏宣南竹枝词选》。编选工作的视线从著名诗人学者和清廷中枢大员扩展到中小官吏和不见经传的文人士子作品；从各种不同流派的诗歌代表作到雅俗共赏的民歌体竹枝词。这些竹枝词所描绘的林林总总的社会生活，鲜活生动，富有京腔京味，是一种必要的补充。

显然，这样的编选原则增加了许多工作量。为此，学会组建了专门编辑班子，由学会会刊《北京诗苑》副主编柳科正先生担任常务副主编，李敏教授担任副主编主持开展工作。经过艰苦努力，共选出365位作者1255首作品，以诗为主兼及词和曲。

虽然，有极少数没有在宣南寓居过，没有写过咏宣南作品的诗人学者，特别是有些满族著名诗人未能纳入选编范围。但总的看来，这部选本大体反映出有清一代诗歌的基本面貌，反映出清代各时期诗歌流派的主要代表作品，可以说是清代诗歌的一个“缩影”吧！

(二)

清代诗词数量浩繁，作者队伍庞大，流派众多。仅据晚清徐世昌辑的《晚晴簃诗汇》就收录诗人六千一百馀家，超过《全唐诗》二千二百馀家的两倍。词的方面，据《全清词抄》收录四千馀家，比《全宋词》收录的一千三百馀家多三倍。读清人诗，有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清初和晚清时期的诗歌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较高的艺术价值，评价也高。但对于中期却往往评价不高。这一时期诗歌量大，可谓洋洋大观。但内容多平庸空泛，格调“肤廓浮滑”、“无创新意”，给人一种风骨衰微的印象。而此时恰恰为康雍乾盛世。

清诗这种发展情状诗评家谓之“马鞍形”。这也是有原因的。清初，正当沧桑变革，国内民族矛盾尖锐。一大批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诗人，写了不少表现民族大义、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

诗篇，使清初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闪耀出以诗歌为武器参与民族矛盾斗争的战斗光芒。其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诗人和作品，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屈大均、钱谦益等，其作品质实浑厚，激越苍凉。吴伟业创造“梅村体”，与钱谦益同称一代诗史。这一时期产生的大量优秀诗篇，有力地转变了元明以来衰颓的诗风，形成清诗马鞍形的前一个高峰。

为什么康雍乾盛世，值得称道的好诗反而少了呢？应该说这与清王朝大兴文字狱和禁书毁版的思想文化禁锢政策大有关系。康熙初期还有平定“三藩”的武事，但到了后期，转向对全国文化思想方面监控。到了雍正、乾隆时期则全心全力于钳辖文化，控制思想，大兴文字狱。有论者说：“无论就时间之长，花样之翻新，手段之残忍来看，都是没有先例的。”（见周宗奇《血光之灾——清代文字狱纪实》）其特点是禁书毁版与文字狱并行。那时结合编纂四库全书，“以征代禁”收缴大量民间书籍，有的加以毁禁或作篡改。据史家考证，这一时期“共禁毁书籍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多部，销毁书版八万块以上”。至于民间由于惧祸而自毁的书籍则不计其数了。不仅如此，清廷还在一些重点地区建立“观风整俗”使，加强社会监控，形成严密的监视网。“一狱兴起，遍查各地。从藏书富家到地方书肆，从案犯内宅到旅人行篋，莫不为查禁之对象”。一案牵连人数多者一百余人。以至“民间告讦之风盛炽，士习民风败坏”。（见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

康雍时期享誉诗坛的著名诗人查慎行，本名查嗣璉，浙江海宁人。康熙二十八年因为在佟皇后丧期观看洪瘳《长生殿》首次演出而被撤职。和他一起观看的几十位官员、名士包括其友赵执信和作者洪瘳均被削籍归里。查为警励自己而改名慎行，号悔馀。他在为赵执信送行的诗里写道：“荆高市上重相见，摇手休

呼旧姓名。”荆、高，即指荆轲和高渐离。可以想见当时诗人、学者们是怎样一种小心翼翼“颤抖”的心态。然而，就是这位“慎行”先生最后仍未能逃脱皇帝的“文网”。雍正四年，他的三弟查嗣庭在赴江西任乡试主考官时出事了。原来，按一般乡试，考生要经三场考试。这次，第二场二题为“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四题为“百室盈止，妇子宁止”。雍正知道后就联系起前时汪景祺《历代年号论》文章案。由于汪在文章中指出，“正”字有“一止之象”。并举例说凡是以此为年号的帝王大都不吉利，没有好下场。为此汪被雍正杀了头。雍正以为查嗣庭出的考题，前题点出“正”，后题点出“止”，是有意为之，实属大逆不道。为罗致罪名，还说查是刚被整掉的隆科多的“死党”，又从抄出的日记中发现他对康熙皇帝的“用人行政”多有“攻击”。三罪并处判以“凌迟”极刑。查嗣庭时已62岁，早在他从江西主考回京，不到三天，就被抄家逮捕。入狱后不到半年即含冤而死了。但人死了罪不能免，仍“戮尸梟示”。他的大儿子被判斩监候，另一个儿子病死狱中，还有两个不足15岁小儿子均被流放三千里以外。当大哥的查慎行这次又受到株连，以“坐家长失教”罪而“放归回里”，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其二弟查嗣，亦康熙时进士，有诗名，遭“谪遣关西”，后死在“戍所”。他们的子女也都被戍三千里之外。可怜查家一门四进士除四弟早年“过继”出门，未遭此难，其余三家两代人，家破人亡，均未幸免。查家的全部财产充为修筑海塘工程的资金。

再举曾久为乾隆皇帝赏识的大诗人沈德潜为例，据《清史稿》记载，在乾隆四十三年，东台县民讦举徐述夔《一柱楼集》有“悖逆语”。乾隆发现在该集前面有沈德潜写的传，有称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的话，惹恼了皇帝。沈德潜此时已死去十年了，但乾隆仍没有放过他，竟“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

清廷的文化高压政策，杀一儆百，使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学术自由受到极大禁束，造成残酷的精神迫害。乾嘉时期被誉为“青莲再世”的诗人张问陶，在一个风雨之夜喊出自己心灵的独白：“百年身世一浮萍，几盏醇醪养性灵。读罢离骚还痛饮，不妨我醉众人醒。”在另一首《感事》写道：“无灾无难不公卿，才算平安过一生。细领痴聋真妙处，始知愚鲁最聪明。”还有年轻诗人黄景仁那首无可奈何的心灵调侃：“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蓬漂尽悲秋气，泥絮沾束薄悻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讖，青鸟秋虫自作声。”这种饱受精神压抑的内心世界，正是在“盛世”光环下一些有才华诗人心态的真实写照！后来，道光五年（1825）龚自珍以《咏史》为题，对当时“万马齐喑”的现状发出了撕肝裂胆的呼唤：“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诗中前两句已为许多人引用过，其实后两句更深刻地表达了他对文字狱严重摧残文人学士心灵的义愤。他仰天长啸，问齐国田横的五百义士哪里去了，难道都被封官列侯了吗？

（三）

清代重视汉文化，从康熙开始倡导经学。他说：“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后来在乾嘉时期形成颇著名声的乾嘉学派，或称乾嘉考据学，广泛涉猎到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包括儒家的经典经、史、子、集乃至天文、舆地、历算、文字、音韵等多方面的研究考据，成为有清一代的主导学术，对清代诗坛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实际上，乾嘉学派与清代历朝的诗人群都有密切渊源关系，也可以说历朝的学者群与诗人群，只是从各有所侧重来区分。像顾炎武一般认为是清代经学的开山大师，但也有名诗传世；钱谦

益是清代早期诗坛领袖，同时也是位考据学者。乾隆中期进一步对科考制度进行变革，除首场“四书”文不变外，把经文列为二场，并增加“八言八韵律诗”的科考。经学与诗学成为科考取士的必备科目，不懂经学或不会做诗就不可能中举考进士。因此，清代的诗人兼学者和学者兼诗人的情况比较普遍。除顾炎武、钱谦益外，在宣南居住过的除诗名外也兼学者的还有施闰章、彭羨门、王士禛、朱彝尊、袁枚、赵翼、张惠言、程恩泽、龚自珍等等，不胜枚举。这种诗人学者化现象对清诗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一方面，提高了诗人的学术文化层次，扩大了诗人的知识视野，开拓了诗歌的境界。尤其清初学者倡导经世致用，直面人生；乾嘉学者讲究考古知今，“抱经世之才，治以富民为本”（时人评戴震语）；在学风上朴实勤勉，困厄不辍，不图荣利等，都推动了“诗教”广布宏扬。即使在康雍乾盛世的文化专制下，一些诗人关心百姓疾苦，反映世道人心，褒贬吏治民风，直抒个人胸臆的作品，仍不绝于书，折射出我国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诗歌文化传统的光辉。

另一方面，由于清廷长期的思想禁锢政策，大兴文字狱等，给清代诗坛带来严重消极影响。其直接后果就是大多数诗歌作品不敢揭露社会矛盾，不敢批评时政，不敢自由表达个人意愿，只能按皇权意愿或歌功颂德，或模山范水。不少有才华的诗人，躲进古文献中，将“故纸堆”当做“安全港”。最典型的有洪亮吉，他是乾隆进士，授编修。他的诗文富有奇气，才华出众，与黄景仁齐名，为江左名诗人。嘉庆时因上书皇帝语多过激，对皇帝大不敬，被贬戍伊犁。后得赦还家，改号为“更生斋居士”，潜心研读经史。正如他的老友张问陶所云：“全焚诗笔留心血，重制儒衣想泪痕”。后与著名学者孙星衍论学相长，世称“孙洪”，在经学研究上颇有成就。

乾隆时期，与大兴考据的同时，在诗坛内部，出现了沈德潜的“格调”说与翁方纲的“肌理”说，更助长了诗歌拟古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蔓延和发展。如沈德潜强调诗的音律节奏，结构对偶，把“格式声调”看成写好诗的关键，将“温柔敦厚”作为诗的原则。翁方纲在《志言集》序中说：“为学必以考据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所谓“肌理”即是义理和文理。这样，在诗风上一味拟古，出现“学问诗”、“考据诗”，把引经据典，作为诗学时尚。在语言上晦涩板滞，读起来懵懂不明，或枯燥无味，所谓“雕文镂彩太纷然，开卷沉沉我欲眠”（张问陶句）。严重影响了诗歌作为励志怡情的形象艺术的光彩。实际上，当时袁枚就批评过那种“误把抄书当作诗”的现象，张问陶也强调“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订~~古人书”，“模宋归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晚清诗人张际亮也明确指出“或以议论考订为诗，或则轻佻浅鄙，无与于风雅之旨”。然而，“天教伪体领风花”（龚自珍句），这种消极影响成了康雍乾盛世诗歌的“硬伤”，使当时诗词的质量处于一个平庸的低谷。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竹枝词作为一种由民歌演化过来的诗体，在康熙年间诗坛领袖王士禛的倡导下，得到了广泛发展。钱大昕说“王贻上（士禛字）仿其体，一时争效之”，乾嘉以后，作者日众，许多中小官吏、知识分子，纷纷拿起笔来，以竹枝为体，用通俗的语言、清新的笔调写出大量竹枝词。宣南地区自然成为作者的“大本营”。无论是反映社会生活，记述历史事变，描摹人间苦乐，大都有血有肉，有声有色，与诗歌创作中的形式主义、八股调毫无共同之处，给当时令人窒息的诗坛吹进一股股清新的空气，使人耳目一新。晚清著名爱国诗人黄遵宪，举起“诗界革命”的旗帜，提倡“我手写我口”，他写的二百首《日本杂事诗》和八十九首《己亥杂诗》都是竹枝体诗歌，对当时的诗坛影响很大。

清代，到了嘉道时期，正处在走向下坡的历史转变期。内则国库匮乏，国祚日衰，灾害频仍，民生凋敝；外则帝国主义列强入侵，鸦片大量输入。严重的内忧外患，使清廷疲于应付，苟延残喘，对知识分子文化思想禁锢政策有所放松。众多知识分子仁人志士从埋头考据的学风中纷纷走了出来，把目光投向社会，投向国计民生，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真是“九州生气恃风雷”，宣南成为众多文人士子结社、展襖、酬唱、吟啸之地。龚自珍，作为这一时期出现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文以磅礴的气势，强烈的爱国热情，深刻揭露和抨击清王朝的黑暗与腐败，呼唤变法改革。他的诗瑰丽奇伟，大歌大哭，打破嘉道诗坛的一潭死水，唤起新一代诗风的兴起，使清诗走向马鞍形的后一个高峰。

2005年5月16日

宣南文化研究概说

黄宗汉

一、宣南文化研究命题的提出

宣南文化是一个崭新而古老的命题。“宣南”泛指北京宣武门外南部一带，基本上包括现今北京市宣武区的大部分。宣南文化是特定的地域文化概念。宣南文化是在清代实行“满汉分居、旗民分治”政策下出现的一种特殊地域文化现象。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宣武区的领导从区情出发，提出了继承和发展宣南文化这个命题。时任区委书记的刘敬民同志曾撰文指出：“北京城有多古老，宣武区就有多古老；‘宣南文化’是北京文化的缩影。继承和发展‘宣南文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跨世纪系统工程。”与此同时，吴良镛院士也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提出：“许多研究北京地域文化的学者认为，北京地域文化的源头在宣南，至少可以说，宣南是北京士人文化、平民文化重要的一处集中地。”而侯仁之院士则以撰写碑文的方式，阐述了宣南是北京建城建都肇始之地。继之清史专家戴逸教授在宣南文化研究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宣南文化是北京历史文化的精华的观点，并在报刊著文，称宣南文化“诚集粹京师文化之精

《宣南鸿雪图志》第5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年版。

《宣南鸿雪图志》第1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年版。

华”。在九十年代出版的文史书刊中，还有赵洛同志发表的《源远流长的宣南文化》和《北京通史》、《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中述及宣南文化的篇章。经历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宣南文化作为北京地域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二、界定宣南文化的三种说法

学术界对宣南文化在北京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大致有源头、缩影、精华三种说法。这是从不同角度来界定宣南文化的历史价值。三说各具特质，各有特定内涵，又互有联系，将三说结合考察，可以窥见宣南文化的全貌。于是就有了这样综合性的提法：宣南文化荟萃北京历史文化的精华，是北京历史文化的源头和缩影。

“源头说”追溯宣南文化形成的历史渊源，认定宣南是北京建城建都肇始之地。北京建城距今已经有 3048 年，侯仁之院士在建于广安门外护城河西岸（滨河公园内）的“蓟城纪念柱”《北京建城记》碑文中一开始就写道：“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曰蓟。《礼记·乐记》载，孔子授徒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其中心位置，适在今宣武区广安门内外。”公元 1153 年金中都建成，在现今宣武区广安门内外一带。侯老在《北京建城记》中论述金中都的建立：“是为北京正式建都之始。惜其宫阙苑囿湮废已久，残留至今者，惟鱼藻池一处，即今宣武区之青年湖。”今年是北京建都 850 周年，作为大国的首都，北京的建都应该从金中都算起。

古代的蓟城只是小国都邑，后来燕灭蓟，将燕都从董家林村迁至蓟城。公元前 312 年公子职被立为王，是为燕昭王。他为

《北京文史》2002 年第 1 期第 17 页。

《北京通史》第一卷，第 79 页。中国书店 1994 年版。

了振兴国家，四方招揽人才，贤士纷纷至燕，于是在燕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为历代文人所称颂。到了唐代燕蓟古城成为幽州府治所在，这里是军事重镇，交通枢纽。唐太宗为悼念征辽阵亡将士在此修建了悯忠寺（后称法源寺）。燕蓟古风、边城要塞使幽州成为诗人吊古揽胜之地，唐初大诗人陈子昂写的《登幽州台歌》就是蓟丘吊古之作，被誉为千古绝唱，李白、杜甫、卢照邻、骆宾王、高适、贾岛等也都在幽州留下了名作。

“缩影说”是将北京历史文化划分为皇家文化、士人文化、平民文化三种类型，论述宣南地域文化是包容了三种类型文化的共生体。明永乐年间兴建了天坛和先农坛，它们是皇家祭祀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精品。有清一代，士人集中于宣南的规模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仅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的人员就有四千二百多人，大部分人都居住在宣南。同时，在宣南还有为接待应试举人设立的几百座会馆，住在会馆的士人，估计有五六千人之多。不仅如此，在宣南还有一些高官的幕府，幕中吸收了不少学人“谈经论史，衡时局，撰文吟诗，著书立说”。上述聚集在宣南如此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自然使这里成为北京士人文化活动的中心。在宣南还有与宣南士人社会相共存的琉璃厂、大栅栏、天桥这样一些独具特色的市井平民文化社区，形成一个完整的城市生活空间。在北京还找不到第二个地方，像宣南这样能够包容如此丰富的皇家、士人、平民三种类型的文化，不妨说要了解昔日的北京就必须了解宣南。

“精华说”是对宣南文化作本质的透析，着重指出宣南文化在清代曾经引领学风、主导潮流、开近代改革之先河，是京师历史文化精华之所在。宣南文化的求实、创新、改革精神，反映了历史上社会进步的趋向。特别是在北京地域文化中宣南士人的群

《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第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体活动，对清代学派的形成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发轫，无不有着密切的联系。京师文化对全国文化的辐辏作用尽显于宣南。

三、宣南士人三个重要群体

宣南文化作为北京历史文化的精华，它是以士人为主体的。曾经在宣南居住、活动并有著述的，史料所记约有七百多人。戴逸教授在宣南文化研究座谈会上指出：宣南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现在就要写出宣南文化的全部内容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倾向于写这么个题目：“清代宣南的士人文化”，可以先写几个士人群体的典型。现就乾嘉学派诸大师、宣南诗坛诸名士、戊戌维新诸先驱这三个士人群体在宣南的活动做一些初步的探究。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经学为精髓。迨至清代经学以汉学为标志，造就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乾嘉学派，宣南是这个学者群体活动的大本营。明清之际，社会激烈动荡，思想家经历了明王朝的衰败与灭亡，从中吸取教训，重新评价儒家和理学，提出了不少新的论说。明末清初的经学大师考据学的开山之祖顾炎武（号亭林），毕生探求“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反对空疏清谈的风习，对后世学者有很大影响。宣南报国寺西侧建有顾亭林祠。

阎若璩对《尚书》潜心研究三十年，著《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列出一百二十八条证据，以辨其伪”，成为考据学的经典之作。与阎若璩同时的还有胡渭。清代汉学发轫之初，阎若璩、胡渭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二人均在宣南入徐乾学幕府，在学术上作出重要贡献。

汉学的发展到清中叶达到高峰，乾嘉学派主导了文化学术潮流。戴震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戴震初入京，住在宣南歙县会

《宣南士乡》第26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